

# 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

## ——评《国共两党关系史》

毛磊 张勇

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马齐彬主编)于1995年1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凝聚了作者们的劳动和心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力作。与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该书对国共关系史这一学科的发展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史料丰富翔实。

该书写作历时近8年,作者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史料收集工作,一方面,搜罗了国内外(包括港台地区)在这一领域的各种已有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历史当事人的专访资料以及近年来公布的档案材料,同时还参考了已发表的论著,包括国外著作中的史料。使用档案如,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美国国务院档案;报刊杂志如《美晚报》、《广州邮报》、《僑民运动周刊》、《伍九月刊》;著述史料如《武汉革命外纪》、《陶锡山日记》等,都是比较新的材料。据粗略统计,该书仅引用的各类报刊杂志就有80余种,涉及各类书籍著作更高达410多种。对有些鲜为人知或其他著作未深入论述的,该书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如黄河归故谈判、国共北平谈判时期关于“三通”的谈判等,使读者感到比较新鲜。因此,就史料占有来看,该书是目前同类著作所不及的。

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本着取精用宏的原则,对一些问题进行论证时,着意从过去纯粹作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如在分析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时,作者对地主买办阶级是南京政权的重要支柱这一观点的论证,

不是泛泛地从理论到理论作定性分析,而是用精确的统计数字和图表进行定量分析。如该书有这样的统计:1933年无锡六个区的乡镇长(包括副职)共235人,其中地主就有184人,占总数的78.3%;据1931年调查,无锡104个村长中,地主占到91.3%;河南44个区长占有的田亩,100—300亩的有26户,占59.1%,300亩以上的6户,占13.6%。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大力提倡的。

## (二) 具有新的见解。

该书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对《汪陈联名宣言》的分析,作者不仅仅一般地指出了它的消极后果,而且详细地分析了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名宣言》的背景和出发点,指出了它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从而有助于客观和全面地评价《汪陈联合宣言》。

又如,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时间与标志问题,史学界历来为此争论不休。一般认为:1946年6月全面内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束;也有人认为;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中共方面仍作了多次和平努力,国民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1947年2月,国民党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而该书作者却认为:国民党于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只是“预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破裂”;1946年7月18日中共参政员被除名,中共和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被取消才是国共彻底分裂的标志,“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第二次国共合作残存的一点痕迹彻底铲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完全破裂”。也许这个观点不一定为所有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但是作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比较有说服力。

## (三) 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

目前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影响国共两党关系演变的国际环境就是一个薄弱点。例如

对于促成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进行重庆谈判的国际因素,在目前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中不是一笔带过,就是不够全面和深刻。该书则专列章节,从美苏两大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入手,深入揭示当时的国际因素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美苏两大国之间的相互妥协,这是造成抗战后中国出现短暂和平局面的国际条件,也是促成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国际因素。”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中对影响重庆谈判的国际因素所作的较为透彻的分析。该书作者类似这样一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国共关系史的研究。

#### (四) 在构架上力图新颖。

首先,此书改变了以往国共关系史与革命史通史几乎等同的写法,而是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历史过程,分析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原因。同时,为了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作者特设“尾声”一部分,对1949年以后40多年国共关系的历史也作了概括性的叙述。

其次,该书有别于完全按时间顺序划分章节的体例,而采用了分专题撰写的方式。这使人耳目一新。采用这种撰写方式是否就一定好也不见得,但作者独具匠心进行尝试,还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该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方面:

#### (一) 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不够全面和充分。

在阐述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对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评价,应当说是国共关系史专著的一个基本任务,而该书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论述却不充分。例如八一南昌起义在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国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里程碑。南昌起义的特殊性在于,它一方面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另一方面在武装起义时仍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详细论述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助于更为深刻地了解国共两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走上了

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而该书却仅在第344页一带而过,作为一本国共关系史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又如中共八七会议,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确定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政策的重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关键转变。然而,对这样一个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该书也未进行论述。

## (二) 个别情节出现错讹。

总的来说,该书的史料丰富而翔实,运用也较精当,但在某些地方仍有疏漏之处。如书中说:叶挺独立团是这两役(指汀泗桥、贺胜桥两役)的先锋部队,它们突破敌军防线,为两役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赢得“铁军”称号(第193页)。众所周知,“铁军”称号的得来固然离不开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但这一称号却是赋予第四军全军,而不仅仅是用来称呼叶挺独立团的。这里的表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又如:(1936年)4月初,陈济棠和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第553页)。这里把两广事变的时间搞错了,两广事变发生于6月。

## (三) 按专题撰写的框架其有机联系不够紧密。

此书按专题撰写,有利于集中笔墨系统地阐述某些问题,使读者更深刻地把握一些历史的关节点,这是它的优点。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该书按专题编排时,有些历史脉络不够清晰。例如该书设有“宁汉对立”这一专题,却没有对“宁汉合流”的专题论述,显得前后照应不周。该书的第九个大专题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其间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反抗斗争的具体论述,就直接到了“两种政权的对峙”,两个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

尽管有上述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它的出版必将把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

(责任编辑:荣维木)